

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及其影响

鲁 虎

内容提要 在短短十几年里,东帝汶天主教徒迅速增多,由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上升到占绝对多数。与此同时,原先作为葡萄牙殖民工具的天主教会不但实现了东帝汶化,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崛起为印尼在东帝汶统治的最大抵抗和反对力量。70年代中期以来东帝汶社会内部的这一巨变,对后来东帝汶问题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进行考察,将有助于弥补东帝汶历史尤其是东帝汶问题的研究偏重暴力冲突和外部干预的不足。

关键词 东帝汶 天主教会 印尼 东帝汶问题 贝洛主教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岛东部,面积仅 18,899 平方公里。17 世纪后,它逐渐沦为葡萄牙殖民地。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东帝汶兴起民族独立运动,并宣布成立共和国,但很快被印尼出兵占领。20 多年中,国际社会从未承认印尼的占领,东帝汶人则以各种形式反抗着印尼的统治。在 1999 年 8 月 30 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东帝汶再次选择了独立^①。持续的动荡和冲突不但使东帝汶一再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使东帝汶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变。其中,宗教状况尤其是天主教会的变迁,是这种内部巨变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本文在此将对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及其社会政治影响作一分析。

东帝汶社会天主教化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东帝汶以原始泛神信仰为主,多种宗教并存。东帝汶偏在印尼群岛的一隅,与印尼的文明中心爪哇岛相隔巴厘、龙目、松巴哇、松巴、佛罗勒斯等岛。尽管东帝汶很早就与外界有了商业往来,但先后在印尼占据主导地位的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并没有留下很深的痕迹。东帝汶人传统信奉泛神信仰,祖先崇拜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各地都设有类似禁地的神屋,内置供祭祀崇拜的神物,外有棕榈叶、树枝、石头、骨头等特殊装饰。主管祭祀活动的人称为神老,在村社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每逢宣战、战胜或重要农时,各部族都由神老主持举行集体祭神仪式^②。

^① 1999 年 10 月 30 日,印尼军队全部撤出东帝汶。在交由联合国管理两年多后,东帝汶于 2002 年 5 月 20 日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② 吉尔·乔利夫:《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Jill Jolliffe, *East Timor,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6 页。

天主教是随着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而带来的。葡萄牙人最先到达东帝汶西部飞地奥库西地区,那里的土著天主教化最早,从17世纪就已开始。除传教士外,最初的信仰者主要是葡萄牙殖民者及其混血后裔。土著加入天主教的属于少数。中部的布那克族最早接受洗礼的时间是1875年7月19日。而最东部图图阿拉地区到1948年1月30日才有第一个土著入教^①。

东帝汶的伊斯兰教徒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商人。据估计,1975年首府帝力约有500名穆斯林,许多人经常颂读古兰经。帝力的科摩罗河口地区有穆斯林商人的集居地。他们积极参与70年代东帝汶争取独立的事业。激进独立运动组织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的60名中央委员中,有7名是穆斯林^②。此外,东帝汶原有一个华人商业阶层,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孔教的信奉者^③。

北部阿陶罗岛居民的宗教构成,反映出葡萄牙殖民统治后期东帝汶宗教的多元特征。1975年前后,该岛有居民5,180人,其中天主教徒1,000人,新教徒2,000人,其余则信奉原始泛神信仰^④。该岛因较早殖民化,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比例相对要高些。

表:东帝汶各教信徒人数变化^⑤

人 数 宗 教	1974年	占总人口比例	1990年	占总人口比例
天主教	220,314	31.99%	676,402	92.76%
原始泛神信仰	460,112	66.80%	—	
孔 教	5,660	0.82%	—	
伊斯兰教	135	0.02%	27,334	3.75%
新 教	2,550	0.37%	20,660	2.83%
印度教	—		3,961	0.54%
佛 教	—		841	0.12%
总 计	668,771	100%	729,198	100%

几个世纪以来,土著居民一直顽强地抵制外来宗教的传播。然而,如上表所示,在1974年以后的短短十多年里,东帝汶的宗教构成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天主教

① 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George J. Aditjondro, *East Timor, an Indonesian Intellectual Speaks Out*),澳大利亚海外援助委员会1994年版,第27页。

② 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42页。

③ 华人较多来到东帝汶是在20世纪以后,主要从事零售商业。关于70年代初当地华人人口,有多种统计数字,如5,660、9,500、14,000和20,000人。1975年后因外迁和在战争中遇害,华人大大减少,到1986年只有3,500人。

④ 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42页。

⑤ 葡萄牙殖民当局1974年统计资料和东帝汶统计局1990年统计资料,转引自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36页。

徒迅速增多。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1974年仅为31.99%,80年代初已超过50%^①,1990年更达到92.76%,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随着大批土著改信天主教,传统的泛神信仰已近乎绝迹。穆斯林人数增长有限,只占总人口的3.66%,而且以外来人口为多。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则主要是80年代来自印尼巴厘岛的移民。如今,天主教已深入东帝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地随处可见新设的天主教标志。北部法图马卡海角矗立有仅次于里约热内卢和里斯本的世界第三大的耶稣像。建于1988年的帝力圣母大教堂,据称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主持了开堂仪式。1989年10月,教皇保罗二世曾在此举行大型弥撒。1993年10月13日,东部马德贝安山山顶也竖起大理石耶稣像,这里不久以前还是印尼政府和革阵游击队激烈交战的地方。现在,东帝汶已是继菲律宾之后亚洲又一个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

东帝汶社会迅速天主教化,是印尼人侵及其统治政策的结果。1975年12月7日,印尼出兵东帝汶,次年7月把它合并为印尼的第27个省。但因国际社会不予承认,更由于东帝汶人不屈的抵抗,印尼始终无法在东帝汶建立起正常有效的行政管理。印尼军事当局对东帝汶实行高压统治,禁止一切政党和组织活动,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东帝汶人。不仅是革阵和支持独立的群众遭到镇压,甚至连亲印尼的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和被迫与印尼合作的帝汶民主联盟,也难逃被解散的厄运。在东帝汶,只有宗教组织能避开印尼清洗,获许继续存在,并享有一定的独立权利。这是因为宗教在印尼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印尼政府奉行潘查希拉即建国五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信仰神道。每个公民被要求信奉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一,这五大宗教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70年代,印尼反共恐共情绪盛行,无宗教信仰者有可能被当作“共产主义者”而受到歧视和迫害。信仰宗教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印尼社会出现一种信教普遍化的倾向。合并后的东帝汶信教选择的压力则更大。东帝汶的泛神信仰不在五大宗教之列,其信仰者自然不被看作是宗教信徒。如果想避免被印尼军队视为革阵的支持者,一个办法就是改宗信仰五大宗教之一。在许多地方,青少年被迫改信新教或其他宗教,否则他们就有被认为是“双头”的危险,意思是暗地里同情革阵的抵抗活动。为切断革阵游击队与人民的联系,印尼军队对游击队活动的山区进行狂轰滥炸。绝大多数山民迁出深山,住进印尼设立的“安置村”。传统信仰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固有土壤,只得日趋消亡。

东帝汶人对印尼的军事占领和高压统治普遍不满,不愿接受和皈依印尼近90%人口信仰的、作为印尼社会文化象征的伊斯兰教。在东帝汶,除天主教外,其他外来宗教的信仰者不足人口的1%,传教基础薄弱。天主教会的影响仅次于泛神信仰,长期以来富有向土著传教的经验。它在大部分城镇乡村设有教堂,有一支热心传教的教士队伍。天主教的十字架、圣母像、教堂等可以取代土著神物崇拜的作用。早先已受洗入教的土著上层也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因此,在土著大规模改宗的过程中,天主教凭着已有的优势,成为东帝汶最具吸引力的宗教。

^①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Carmel Budiardjo and Lim Soei Liong, *The War against East Timor*),伦敦泽德书业1984年版,第119页。

天主教会东帝汶化

在东帝汶近现代历史上,天主教既是葡萄牙殖民入侵的后果,也是维护和稳固殖民统治的工具。传教士往往同时充当殖民活动的先锋,而教会可能是东帝汶封建地产的最大所有者^①。1940年,罗马教廷与葡萄牙达成协定,其中对天主教在海外殖民活动中的独特作用作了总结:“葡萄牙天主教传教使团对帝国极为有用。它们发挥着一种突出的文明影响。”^②根据这一协定,葡萄牙天主教会将垄断殖民地的宗教事务。葡萄牙显然是要进一步加强天主教的地位,并按照宗主国的模式来改造其殖民地。1941年,葡萄牙把殖民地的教育权交给了天主教会。战后东帝汶教育有所改观,教会学校增多,但受教育者只占东帝汶人口的极少数。如同殖民机构的构成一样,东帝汶天主教会的中上层一般都是葡萄牙人或其混血后裔。他们代表的是殖民者阶层的利益,对贫困土著的命运漠不关心。

在70年代中期的政治巨变中,东帝汶天主教会经历了冲击、分化和重组。革阵著名领导人阿马拉尔、洛巴托和拉莫斯-奥尔塔都是天主教徒。70年代初,他们就开始利用教会报刊宣传民族主义思想。1974年5月东帝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后,受教育的青年天主教徒是革阵的骨干和支持者。革阵政治上主张迅速独立,宗教上提倡政教分离,认为教会在未来社会中不应拥有特权,但注意避免与教会冲突。东帝汶的种植园主和高层公务人员也是天主教徒,但他们一般要求维持现状,支持与葡萄牙保持联系的帝汶民主联盟。某些天主教人士最初对与印尼合并也抱有美好的愿望。少数土著教士参加了亲印尼的帝汶人民民主协会的活动。法蒂玛修道院著名教士、神学博士安东尼奥·达·科斯塔支持最终并入印尼的想法,提出东帝汶的天主教徒以后应去邻近的印尼佛洛勒斯,而不应舍近求远,到葡萄牙或澳门去学神学。不过,他认为不急于在两三年内实现政治上统一,而应首先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上增加来往^③。尽管如此,教会总的态度是保守的,它害怕和反对变革。1975年1月,葡萄牙人帝力主教何塞·胡阿奎恩·里贝罗说天主教是“葡萄牙国家的传统宗教”,强调教会的财产权应受到尊重。他对革阵明显怀有恶意,宣扬它受到共产主义影响,并警告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会消除东帝汶人民的积极价值。”^④里贝罗甚至与印尼一唱一和,诬称革阵得到北越武装人员的支持^⑤。

在东帝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天主教会没有发挥出一个大型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至少是没有积极站在东帝汶人民一边,成为东帝汶利益的捍卫者。拉莫斯-奥尔塔认为教会是脱离东帝汶普通民众的^⑥。1975年8月,帝汶民主联盟发动反对革阵的政变而引发东帝汶内

① 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15页。

② 约翰·J. 泰勒:《印尼被人遗忘的战争:东帝汶秘史》(John J. Taylor, *Indonesia's Forgotten War: The Hidden History of East Timor*),伦敦泽德书业1991年版,第13页。

③ 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3页。

④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17页。

⑤ 吉尔·乔利夫:《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第118页。

⑥ 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4页。

战,90%的葡籍教士和修女逃往葡萄牙。革阵主席阿马拉尔抱怨,教会像在二战日本人侵入时逃往澳大利亚一样,又一次抛弃了人民^①。面对印尼入侵后的混乱局面,里贝罗主教只是哭泣。他对象征葡萄牙的东西遭破坏感到伤心,但除要求辞职外并没有做更多的事。当时,葡萄牙对东帝汶非殖民化的政策既不积极,也不明确,对事态发展和印尼干预抱着无能为力、听之任之的态度。内战伊始,葡萄牙东帝汶总督勒莫斯·佩雷斯就率殖民机构撤往阿陶罗岛。9月,革阵依靠人民支持控制了局势,此后一再要求勒莫斯·佩雷斯回来监督独立进程,但他拒绝返回,致使印尼更有借口出兵“制止”东帝汶的“混乱”。东帝汶天主教会的消极逃避,恰是葡萄牙这种政策的又一反映。教会还受到罗马教廷观望和暧昧态度的影响。东帝汶作为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主教管区,帝力主教是东帝汶主教管区的最高负责人。但罗马教廷既没有公开谴责印尼入侵,在里贝罗主教离去后也没有马上任命新的帝力主教。

葡籍教士和大量混血后裔撤离,客观上为天主教会东帝汶化创造了机会。许多土著教士随革阵战士撤入深山,逐渐加深对革阵事业的了解。在重建天主教会的过程中,土著教士走上前台,崛起为教会中的主导力量。1977年,东帝汶人马丁胡·达·科斯塔·洛佩斯出任帝力主教。东帝汶教徒历史上首次有了自己的教会领袖。这是东帝汶天主教会发展的转折点。新一代教会各级领导人与革阵战士同龄或更为年轻,向往变革和现代化。他们同样经历过政治动荡的年代,对印尼的统治和人民的遭遇有切身的感受。教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但它同情受难人民,因而也以各种方式为人民代言。随着东帝汶人苦难不断加剧,教会扮演起一个新的社会角色。天主教由一种为殖民活动服务的外来宗教转变为东帝汶民族的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东帝汶天主教会日益东帝汶化,但并没有朝着印尼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它一直拒绝与印尼天主教会合并。印尼占领东帝汶后,禁止公开使用被视为殖民者语言的葡萄牙语。1981年,印尼政府要求东帝汶天主教会用印尼语取代葡萄牙语传教。东帝汶教会表示反对,进而要求罗马教廷准许它把当地通用语——德顿语作为传教用语。10月,教廷批准了这一请求。这加强了教会和人民的联系,大大便利了土著接受天主教。1983年,印尼要求把奥库西的天主教会划归西帝汶的阿坦布阿主教区。帝力主教征询了奥库西教会的意见后,拒绝了这一要求,从而保持了东帝汶教会的统一和完整^②。1975年后,东帝汶天主教会被迫中断了与葡萄牙天主教会的关系,但它没有因而合并为印尼天主教会的一部分,而是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1982年,教廷明确拒绝了两个教会合并,理由是东帝汶天主教与印尼天主教“一样成熟”^③。

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地位和影响

东帝汶天主教会是外界最初了解东帝汶状况的主要消息来源。在印尼的封锁下,教会仍设法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例如,1976年底,教会人士向外透露,自1975年12月印尼入

①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17页。

②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23页。

③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19页。

侵以来,东帝汶已有6到10万人死亡,但印尼只控制了东帝汶20%的领土^①。1979年,艾纳罗县的一位教士称,当地已有5,021人死亡^②。这些信息虽然数量有限,来源也不稳定,但因教会的“中立”特点,却成为国际社会谴责印尼出兵和合并的最有力的证据。

80年代初,东帝汶天主教会的重建基本完成。随着新入教人数的迅速增多,教会的力量日渐壮大。1981年7月31日,教会发表“信仰反思”声明,宣称“东帝汶的人民正在经受苦难。……东帝汶教会与人民休戚相关,而且正因如此,觉得有义务表达出人民的信仰。……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这个位置有助于理解和更好规范人民的信仰,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的语言、标准和心灵。”^③该声明标志着教会立场的重大转变。教会经过长期的思索后,已不甘沉默和顺从,而是决心代表东帝汶人的利益说话。

此后不久,在一次12,000人的宗教集会上,洛佩斯主教不点名地批评印尼统治。他写信给葡萄牙天主教救济会,说因印尼的军事行动,东帝汶各地将再受饥荒。10月底,东帝汶教会指责世界天主教会东帝汶人民的悲惨遭遇保持沉默。印尼要求东帝汶教会支持印尼的合并行动。洛佩斯拒不表态,反而向印尼抱怨成千上万的东帝汶人生存没有保障。1982年2月,洛佩斯向外界宣布,前一年有500名东帝汶人在一个教堂被印尼军队屠杀。次年5月,在印尼的压力下,洛佩斯被迫辞职出国,但他坚持为东帝汶的命运呼吁。他称,印尼入侵以来,已造成东帝汶20万人、即将近1/3人口的死亡,其中6万人被杀,14万人死于饥饿^④。这一数字据认为是建立在各级教会调查的基础上的,因而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在国外,洛佩斯甚至公开表示支持革阵的抵抗事业。

1983年8月,罗马教廷任命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继任帝力主教。贝洛长期在国外研究神学,又从未在东帝汶教会中担任过职务,被各方认为是最不具有东帝汶色彩的人物。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在讲道中抗议印尼军方逮捕东帝汶人士。11月,他又在印尼天主教会议上提出,印尼教会应注意东帝汶令人震惊的局势。主教会议为此发出公开信,呼吁印尼天主教会帮助东帝汶孤儿,重振当地的教会学校^⑤。1985年元旦,东帝汶主教理事会对逐渐导致东帝汶人种族、文化和宗教灭绝的事态深表焦虑^⑥。

1984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对东帝汶极其不利。印尼已控制东帝汶全境,联合国也无限期推迟审议东帝汶问题。然而,贝洛主教领导下的东帝汶天主教会没有接受既成事实。它的态度反而更加明朗化,公开提出应该以全民公决方式解决东帝汶问题。1989年2月6日,贝洛主教致信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指出印尼在东帝汶存在大量违反人权的行为,要求让东帝汶人进行公决^⑦。1991年11月,帝力发生印尼军警屠杀示威群众的事件。贝洛把许多

① 吉尔·乔利夫:《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第301页。

② 乔治·J. 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12页。

③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18页。

④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50页。

⑤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23页。

⑥ 约翰·J. 泰勒:《印尼被人遗忘的战争:东帝汶秘史》,第154页。

⑦ 克利福德·汤普森编:《诺贝尔奖得主:1992-1996年补集》(Clifford Thompson, ed., *Nobel Prize Winners: 1992 - 1996 Supplement*), H. W. 威尔逊公司1997年版,第49-50页。

示威者藏在他的教堂和寓所里加以保护。事后,他公开谴责印尼军人对平民的军事镇压,并为死难者举行弥撒。这一事件也使贝洛成为印尼统治政策更加坚定的批评者。他认为,“多数东帝汶人,不管在城市或在农村地区,都想得到自决和独立的权力,但他们害怕表达出来。”^① 他指责印尼政府在东帝汶建立的是一个与潘查希拉不相容的“警察国家”。1994年7月,在致印尼政府的公开信中,贝洛表达了对东帝汶人民命运的关切,要求印尼减少驻军,取消压制政策,扩大教会的自由,允许言论自由,开展与国际组织间的对话,允许东帝汶民主公决,以及立法给予东帝汶特别地位和更大的自由。因为印尼政府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回应,贝洛在1995年后甚至拒绝参加印尼的国庆庆祝活动^②。

东帝汶天主教会对印尼的其他政策也深感不满。它不赞成在东帝汶实行计划生育。天主教一贯反对堕胎,不过教会对该政策持异议的真正理由,是东帝汶人口已减少得太多^③。东帝汶人均收入不足200美元,是印尼最穷的省份。针对印尼促进了东帝汶经济发展的说法,贝洛驳斥道:“这种发展是为了谁呢?……不是我们,东帝汶人。是那些他们带过来的移民。”他又说,“所谓的发展”正在用来“改变我们的社会,摧毁我们的社会”^④。“所有教师来自外地,所有公务员来自外地。走进任何政府办公室,所有的职员都来自外地。连最简单的修路工作,他们也从外地招人。而这些人又带来了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东帝汶的情况就是这样,军人无处不在。所以又给老百姓留下了什么呢?”^⑤

在洛佩斯和贝洛两位主教的领导下,东帝汶天主教会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各地教会办起孤儿院,使众多的孤儿得到照顾,而这些孤儿许多是独立运动战士的后代。此举让在深山坚持战斗的游击战士免除了后顾之忧。教会还广泛组建以教区为基础的诊所医疗保健体系。在教育方面,教会通过自己的圣保罗教育基金会,建立有93所小学、30所初级中学、11所高中和4所技校。在东帝汶的三所高等院校中,位于第二大城市包考的法图马卡技术学校就是教会主办的^⑥。尽管同样实施印尼国民教育,但在教会学校中,葡萄牙语重新成为教学语言之一。年轻人私下讲葡萄牙语,来突出自己的东帝汶人特色。作为人民的依赖和寄托,天主教会得到人民越来越多的拥戴和信任。尤其是贝洛主教献身教务,体察民情,加上博学多识,正直敢言,逐渐成为东帝汶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同时被外界视为“东帝汶人民最重要的代表”^⑦。

天主教会能够合法、公开和有效地联系和团结东帝汶民众,并且不断发出与印尼政府“不和谐”的声音,因而与政府和驻军经常处于一种对立状态。80年代中期,大规模武装抵抗转为游击战后,青年学生成为经常性抗议活动的主力,教会则是东帝汶人国内抵抗网络的实际庇护者。印尼军政当局不信任东帝汶的天主教会,但教会接近人民,通过教会传递信息既迅速,又

① 亚当·施瓦茨:《等待中的国度,90年代的印尼》(Adam Schwarz,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韦斯特维恩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② 乔舒亚·埃利奥特:《印尼手册》(Joshua Eliot, *Indonesia Handbook*),福特普林特1996年版,第786页。

③ 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16页。

④ 克利福德·汤普森编:《诺贝尔奖得主:1992-1996年补集》,第49-50页。

⑤ 亚当·施瓦茨:《等待中的国度,90年代的印尼》,第220页。

⑥ 杰弗里·C. 冈恩:《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Geoffrey C. Gunn, *East Timor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Case of Intervention*),新泽西红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⑦ 杰弗里·C. 冈恩:《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第237页。

能为人接受,因而双方都避免公开冲突。鉴于潘查希拉的基本原则,印尼政府无法禁止东帝汶的天主教,但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印尼不承认天主教在东帝汶享有排他性地位,坚持宗教多元化,并且鼓励非天主教徒移入。80年代以来,爪哇和苏拉威西的穆斯林以及巴厘岛的印度教徒,移民到东帝汶的多达十几万人。邻近的印尼东努加登沙拉省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地区,该省尤其是西帝汶的天主教徒大量流入东帝汶。这些移民一般是亲印尼势力。此外,印尼积极实行国民教育体制,强迫东帝汶青少年宣誓效忠印尼,并在东帝汶城镇大量建造统一纪念碑。不过,这些都无法阻止东帝汶天主教会影响的日益扩大。

天主教特色也是东帝汶问题重新受到国际关注的原因之一。1982年5月,罗马教廷拒绝承认东帝汶并入印尼,但此后一直采取默认既成现实的态度。进入90年代后,世界冷战结束,西方大国开始推行“人权”外交。国际上的天主教势力与人权势力对天主教地区的政治干预明显加强。1994年,教皇谈到东帝汶人民的正当愿望,说教廷可能愿意接受合并之外的其他方案。因顾及与印尼的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不便支持革阵和后来的独立运动组织东帝汶民族抵抗理事会,但公开鼓励东帝汶天主教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天主教会议就专设有东帝汶问题顾问,并通过新闻媒体不断报道东帝汶教会的消息,提起人们对几近遗忘的东帝汶问题的注意。1994年10月,贝洛主教和独立运动海外领导人拉莫斯-奥尔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中就有国际天主教势力全力支持背景。两位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和爱尔兰人权活动家梅雷德·马奎尔促成了此事。颁奖委员会称印尼在东帝汶20年的统治是“有计划的压迫”,并“希望该奖将促进在人民自决权的基础上为冲突找到一种外交解决”^①。

不管有关各方是否愿意接受,天主教会在东帝汶的突出地位是必须承认的现实。1995年6月和1996年3月,印尼统治下的东帝汶人代表和海外要求独立的东帝汶人代表两次在奥地利对话。双方代表都对天主教会和贝洛主教在东帝汶的贡献表示“特别感谢”^②。在1998年后东帝汶问题的解决中,教会独特的重要性得到充分体现。为了达到独立或自治的目的,各派政治力量较量争斗,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然而,无论是独立运动组织,支持独立的群众,还是印尼政府,亲印尼的群众,抑或是印尼的政治反对派,以及国际组织,都对东帝汶天主教会表现出格外的尊重,都想争取到教会的支持和合作。教会的一贯立场是呼吁和平与民族和解。它谴责亲印尼民兵的暴行,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并举行大型和平集会。1998年9月和1999年6月,教会两次主持邀请各派召开东帝汶对话与和解会议。冲突派别每次达成和平协议,都有教会代表在场。1999年4月21日,各派和平协议就是在贝洛主教的寓所签署的。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天主教会的调停下,亲印尼民兵和东帝汶解放军终于在全民公决前夕签署停火协议,从而使联合国主持的公决投票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教会一直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要求向印尼施压,派出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至于是赞成自治还是愿意独立,教会始终没有明确地表态。贝洛只是号召教徒无所畏惧地走向投票箱,按照良知投票,并平静地接受投票结果。正因地位超然和态度“中立”,东帝汶天主教会才在关键时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① 杰弗里·C·冈恩:《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第237页。

② 杰弗里·C·冈恩:《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第207页。

结 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天主教会的变迁是东帝汶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天主教已由少数统治阶层的宗教转变为东帝汶人的宗教,教会由殖民工具转变为东帝汶人利益的代表和保护者。天主教已是今日东帝汶社会和文化的最大特征。这一变迁在如此短期内发生,是与印尼入侵中断了东帝汶非殖民化的自然进程以及印尼后来统治政策的特点分不开的。东帝汶天主教会变迁的意义不仅在于宗教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社会天主教化和教会东帝汶化,使东帝汶各部族迅速由分裂走向统一,催化了东帝汶民族意识的形成。随着时间推移,教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民心,影响力日益增强。天主教会不但是东帝汶最大的民间组织,而且成为东帝汶人利益惟一合法的代言人。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帝汶天主教会不但在团结和领导人民上替代了当初革阵的角色,而且也是东帝汶人争取国际支持的主要力量。教会虽从未明确表态赞成合并还是独立,但从尊重东帝汶人意愿并积极为东帝汶人代言来看,其支持独立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通过向外界透露信息、对印尼的镇压行为和统治政策提出抗议、为独立运动人士提供保护、在国际上呼吁让东帝汶人全民公决以及扮演超越各派的协调人角色,教会在“中立”的外表下已经越来越参与到现实政治中,逐渐崛起为印尼在东帝汶统治的最大抵抗和反对势力。由于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合作态度,印尼虽然消灭了东帝汶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但它谋求合并合法化的努力始终无法取得真正成功。这是东帝汶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正是天主教会的这些变化及其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决定并保证了东帝汶最终走向独立。

受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及其影响,它在东帝汶问题中的位置,只是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当然是需要说明的。

[本文作者鲁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马新民)

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及其影响

作者: [鲁虎](#)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刊名: [世界历史](#) PKU CSSCI
 英文刊名: [WORLD HISTORY](#)
 年, 卷(期): 2003, ""(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31条)

1. [吉尔·乔利夫](#) [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1978
2.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1994
3.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4.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5.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1990
6.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1984
7.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8. [约翰·J.泰勒](#) [印尼被人遗忘的战争:东帝汶秘史](#) 1991
9.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10.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11. [吉尔·乔利夫](#) [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12.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13.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14.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15.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16. [吉尔·乔利夫](#) [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17.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 [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
18.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19.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20.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21. [约翰·J.泰勒](#) [印尼被人遗忘的战争:东帝汶秘史](#)
22. [克利福德·汤普森](#) [诺贝尔奖得主:1992-1996年补集](#) 1997
23. [亚当·施瓦茨](#) [等待中的国度90年代的印尼](#) 1994
24. [乔舒亚·埃利奥特](#) [印尼手册](#) 1996
25. [卡梅尔·布迪亚佐](#) [针对东帝汶的战争](#)
26. [克利福德·汤普森](#) [诺贝尔奖得主:1992-1996年补集](#) 1996
27. [亚当·施瓦茨](#) [待中的国度90年代的印尼](#)
28. [杰弗里·C.冈恩](#) [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 1997
29. [杰弗里·C.冈恩](#) [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
30. [杰弗里·C.冈恩](#) [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
31. [杰弗里·C.冈恩](#) [东帝汶和联合国:干预实例](#)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ls20030100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df3da280-b636-42f7-835a-9e4d007c4748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